

第一篇

我国 20 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第一章

20 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早期产生的一种批判性的文化思潮。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分化的一个产物，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 20 多年。我国的学者是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他们试图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扬弃而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而，这 20 多年，是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我们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最早的一般性介绍和评述，到人们抱着浓厚的兴趣而大量“接受”这一外来的思潮，再到后来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和性质，使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现在人们更为关注的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关系，以及这种理论的现实意义，力图使之与我国的哲学研究相结合找到一种新视野、新方法、新道路。

一、引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徐崇温先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地“引进”到中国来。我们只要打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一些主要理论刊物，看看上面的文章，就会感受到一种新思潮扑面而来的气氛。我们只要注意当时出版的一些理论研究著作，也会发现有不少著作同这种新思潮有关。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 年到 1984 年间，《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国内重要理论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过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文章，总数不少于 500 篇。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般介绍和总体评价。尽管有些看法较为武断，但还是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二，关于国外学者对卢卡奇思想的研究以及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的争议。第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广泛的评述，试图弄清该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第四，有关萨特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尝试性评述。虽然这些文章的内容不是很深入和具体，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免片面，但是它们为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素养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除了这些文章以外，这个时期还有几本重要的相关论著也同国内读者见了面。主要有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德国学者霍尔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国

内学者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和 1986 年杜章智主编的《卢卡奇自传》等。通过这些论著，读者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从中受到不少的启发。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刊物杂志和出版部门积极地向国内“引进”这种新思潮；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的读者热忱地“吸收”这种外来的思想。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自然形成了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当然，这一时期人们的研究仍然放在人头式的论述与现象性的分析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由及其内在线索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

二、评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引进，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介绍，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吸收”，而是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有一个准确的评价。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实际内容后，就对原有的某些较简单的规定和批驳提出了质疑。1986 年 8 月在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现代的“修正主义”；有些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太笼统，无法使人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些人则提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代表人物应该分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把他们全部看做反马克思主义的。

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就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表了
许多文章，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发表了郭庸的
文章，题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吗？》。文中
作者不同意把葛兰西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要求对葛
兰西的“实践哲学”作出一个更加公允的评价。针对国内当
时出现的这些争论，徐崇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
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的若干问题》。作者就几个重要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其次，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传统；第三，葛兰西尽管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
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第四，阿尔都塞是站在结构主义的
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阅读的；最后，虽然西方
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能在
它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针对徐
崇温的这篇文章，杜章智在《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
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该文题为《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长期以来
在我国学术界被笼统地当作‘非马克思主义’使用，这实
在不利于我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因此，他提出“废除”这个概念，不要把卢卡奇、葛兰西、
阿尔都塞等人同萨特等人混为一谈，当作是反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家。以这次辩论为起点，很快，在国内展开了一场有
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现
代哲学》、《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了
有关这场论争的不同意见。人们的论争集中在这样几个问
题上：一是关于西

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使用及其总体评价；二是怎样认识和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是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大家的出发点都是良好的，那就是认真地思考，希望能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的评价。尽管这场论争还不够深入，有些观点还是感受式的或印象式的，缺乏缜密的和具体的理论分析，而且学者们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毕竟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同时，这一时期也有国外研究的相关著作被译为中文出版，比如戈尔曼（Lucien Goldman, 1913—1970）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和 1992 年版）。这些著作译成中文后，对于当时国内的理论研究起到了一个补充的作用，国内的研究者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理论成果与观点，这使得当时人们的思维与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加继续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潮正式形成。

三、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思想解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标志就是有关这个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

理论著作被大量地翻译出版。因为争论的焦点问题和不同论点的产生，都要求直接阅读和研究文本本身。所以，十多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已被陆续翻译和出版。最突出的是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译著和著述 30 余本，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重要理论著作，也包括国内一些学者撰写的研究著作，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国内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论著。在这一时期同读者见面的有：本·阿格尔（Ben Agger, 1938—）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陈先达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欧力同、张伟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小兵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当代人本主义思潮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等。

这些译著和论著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出版，直接推动了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热潮。1990 年以后的几年间，国内的众多理论学术刊物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评介文章。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举出其中的一些篇名作为例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国防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新趋势评介》（《江淮论坛》1990 年第 2 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评析》（《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4 期）《论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 年第 6 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江苏社会科学》

1992年第6期)、《卢卡奇和他的 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人文杂志》1993年第5期)、《关于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期)。在此基础上,1994、1996、1998和1999年都曾召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1996年还正式成立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时期如火如荼的理论研究热潮感染了大量的学者和读者,人们纷纷加入到这场讨论之中,一方面人们加大了对相关文本的研究力度,提出了自己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整体性的分析与个别代表人物的独特理解与看法,因而这一时期的争论也更为激烈;另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较以前更为深化,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论争,还把它扩展至其他方面,比如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不同的学者作不同的理解。

四、深化

世纪之交,国内进一步发表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论著和文章。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衣俊卿等同志编写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这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也是最全面的理论成果。该书深入剖析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分化的理论原因与社会历史背景,从而比较完整地把握了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状况和存在格局,并把它归纳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

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五个部分，而且认为它们无论是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自我分化的产物和结果。该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相对完整地还原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与主要观点，为人们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前提基础。与此同时，海南出版社也出版了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哲学派别来对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理论、辩证法理论以及社会历史理论等六个方面来系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派别的特征及理论样式。作者力图通过该书，深化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认识和把握。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并以此为指导精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与此同时，人们加大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其重要表现就是相关的文章大量刊发，论文集相继出版，也形成了一批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门人才。在 2000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的论文集，其中收录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福建论坛》文史哲版在 2000 年第 4 期中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理论逻辑和现实的嬗变进行了专题性的讨论，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张一兵、仰海峰、刘翎、唐正东、张亮、戴季江、王恒、亦思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的学者从最基本的理论视角出发，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重新展开了争论。王雨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 年第 9 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

一文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由此引发了学界的不同声音。徐崇温在《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中发表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针对王雨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王雨辰又在《江汉论坛》中发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辨析》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徐崇温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中，刊发了《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要用现代西方的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如果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会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正统地位。还有一些文章像《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6期）、《西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河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解读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文章的刊发，标志着在新的世纪，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进一步明晰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真实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实关系、西方马克思与现代哲学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上，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与发展向度上的作用进一步明朗。但是，也应看到的是，直至现在，我国学者也没有针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学界的争论仍在继续，而

且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本身的性质及定位仍存异议，其发展的时间段落也仍存异议，有人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派别现在已经不存在，其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后马克思主义或晚期马克思主义；而有人则认为它直到现在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广阔空间。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我们的研究不可能一步到位，这种争论的过程在客观上也将不断促进人们的认识与思想的成熟。

总之，20多年来，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接受、争论、深化的过程，其实质是进一步探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热点问题在今天不外乎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由来性质的理论研究以及它对于当代哲学、当代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的影响为切入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深刻的反思，从而试图形成对何谓回到马克思、如何走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同时代的问题的解答，并形成继续探讨 21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讨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一理论热潮出现的背后，还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走向问题。大家都已经同意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而对于如何去发展、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当代人应依据当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问题作出符合时代的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对于我国学者的研究不仅仅有一个启发的作用，也不仅仅有一个影响的作用，学者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国情，做出符合我国理论的和实践的解释。尽管国内的学者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各种意见，但是大家所公认的是无论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怎样的理解，都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确考察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并试图找到对策，他们也研究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弊端，这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成果，为我们探索解决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样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们研究的聚焦也不应仅仅囿于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上，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为我所用，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章

20 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要争议

一、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问题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 20 世纪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显然与对他的关键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并且这种评价直接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争议之源。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于 1923 年发表以来，对其理论性质和主导倾向的评价，国际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国内有的学者把书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看做

“瑕不掩瑜”，“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的学者则认为书中的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挑战”，“其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等等。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凭借的理论尺度不同，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卢卡奇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而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则认为卢卡奇强调主客体关系和改变现实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本来思想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即使都声称凭借实践唯物主义的尺度，由于理解的不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评价。比如，一派认为，卢卡奇要求对人类社会生活作整体、全面的理解，即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和高于自然历程的特点，因而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另一派则认为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忽视了“第一自然”的前提，否定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社会哲学；而且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不以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并在最后归结于意识，因而不能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总的说来，与国际上的“卢卡奇热”相似，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和评价，也有一种从贬到褒、从否定到较多的肯定的趋势。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究竟树立了一面什么旗帜？它的理论思维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并未明确解决的问题。

二、怎样认识和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问题

这是多次争议的焦点，大致有三派观点：（1）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2）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就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3）认为不能先入为主或一概而论地笼统定性，应当就不同派别、不同代表人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第一派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行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主张一种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提出了一条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主义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了，否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缘。后两派观点反驳前者的理由主要是：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时，正值西欧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又在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内受到排斥和批判，经常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很难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于所受传统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不少著述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也确有晦涩难懂的一面，但这种思潮没有失去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敏感，而能对重大历史事变作出积极反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探讨，一批又一批地出版专著。其中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批评，还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分析以及新的战略、策略主张的提出，都正是试图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某种结合。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研究和吸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部分或因素，并不等于主张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而正说明他们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脱离，这种工作和成果即使发生偏差和错误，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其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线索和自身分化。这种倾向在理论上不免有所偏颇和失误，但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和可借鉴的因素，如体系结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辩证语法的分类、实践观与反映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各自的思想特色和差别问题，等等。其三是这种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学派力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哲学，突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活动，从各个角度发挥了人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但每个派别对科学技术发展负效应的揭露，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考察，对人的心理因素和微观领域的探索，对个人问题、人的价值和个性的研究，可能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忽视的和比较薄弱的方面，因而也值得认真考察和借鉴。

三、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应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

1. 根本对立、应予排斥论。认为这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虽然自称为马克